

“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实体经济,只有虚拟经济,那会出问题的。”李子彬不无忧虑地说。以美国为鉴,原本美国实体经济也很强大,后来由于成本竞争,将一部分制造业转移到国外,导致实体经济“空心化”,失业率居高不下。现如今,美国又掉过头搞新一轮工业化,提倡发展新兴战略工业,深知过去虚拟经济搞过了头。

这对一国经济大计而言,不能不说是深刻的教训,也为中国经济敲响了沉重的警钟。

(邓摘自《新经济导刊》2011年第8期朱敏/文)

### 八成新生不愿“农转非”

浙江农林大学今年新入学的农村学生中,把户口迁到学校的很少,按目前报到的情况统计,最多不超过2成。

八成新生不愿“转非”为哪般?相关报道给出了两种原因:一是难舍农村户口红利;二是折射城市生存困境。其实还有一种原因也很关键,那就是户口在城市中的作用已日见其小,比如在就业上基本已不存在户籍限制,在城市工作后一年外地人也可以获得购房资格,更重要的是,现在户口的迁徙比以往更加自由,只要是本科学历就可以在省城轻松落户。

说到“难舍农村户口红利”,表面上看是城市化的快速发展,让农村户籍的利益链条不断加长,如拆迁补偿、征地补偿,还有价值不菲的宅基地分配,但深层原因,不能不说是中国特有的城乡二元分割式的户籍制度的物极必反——户籍上面承载着利益,户籍没有了,利益就没有了。

我国农村普遍实行的是“集体所有制”。依据中国的法律,“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相比于“国家所有”,“集体所有”在产权上更为明晰,顾名思义,“集体所有”就是“集体”之中人人有份。但现实中的荒唐之处在于,如果你的户口迁离这个“集体”,你的那一份所有权也随之被充公。

无数的事例证明,所谓“集体所有”并非字面上显示的那样产权明晰。要让“集体所有”真正落

实,就必须把产权落实到每一个人身上,比如将集体经济以股份的形式分配给每一个“股东”,而“股东大会”则是整个集体的最高决策机关。产权的明晰,让个人的权益得到确认。如果一个人迁走了户口,而其作为股东的权益还在,那么所谓“农村户口红利”也便成不了大学新生的后顾之忧。

(李摘自《青年时报》2011年9月7日翟春阳/文)

## 其他

### 中东乱局:制度设计与发展模式之误

中东是一块襟连“五海三洲”的战略要地,是东西方文明的“十字路口”。既出现过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和灿烂文化,也诞生了影响世界半数以上人口的三大宗教,同时,有着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也是世界重要的海陆空交通枢纽,历来乃兵家必争之地,所以一直战乱不断。今年以来的中东之乱,不同以往,是阿拉伯国家发展到一个历史性低谷,面临着国家与民族再次复兴巨大瓶颈时的自我突破。一言以概之,中东之乱,危机源自内力而非外力,诉求始于民生而非民主,症结在于整个社会系统需要改版升级而非简单修补。

#### 1. 危机源自内力而非外力

不少国人以“阴谋论”的方式看待阿拉伯国家变革。实际上,这次阿拉伯变革与动荡,第一动力来自变革国家内部和社会底层,而不是外部势力。宗教势力、反对派和外力都是街头运动风生水起渐成规模后才抓住时机、陆续跟进、因势利导、介入干预的。

事实上,这不是一场令人讳莫如深的“颜色革命”,而是“本色革命”或“无色革命”。这是一场典型的“三无”运动——无明显宗教主张驱动,无强大反对派组织,无明显外来敌人唆使,特别是作为震源的突尼斯和埃及。

这场变革具有明显的自发性和内生性。它不同于以往自上而下的精英改良或军事政变,完全是一场自下而上的公民运动,不仅事先了无迹象,“大风起于青萍之末”,而且起初缺乏统一的组织、宗旨、口号、纲领和目标,呈现明显的盲动性和草根气质,并在对抗与磨合中逐步形成更高、更清晰

和更统一的政治诉求——变革政权。它也不同于以往异质文明进入而触发的冲突,而是从地缘政治位置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都处于核心区域的两个国家发轫,向周边国家和外围渐次传递,外溢效应迅速而显著,在当代国际政治史上颇为罕见。

从横向的维度看,这场阿拉伯剧变产生的“冲击波”堪比上个世纪 90 年代初苏联东欧剧变。从纵向的维度看,其在阿拉伯和中东现代史上的意义堪比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阿拉伯民族独立运动,只不过那次的运动是以反帝、反殖、反封建为主,诞生了一批独立的民族国家,而这次的运动以反专制、反腐败为主,体现了公民意识的觉醒,是一次自下而上的社会变革。它无疑将对整个中东地区的力量格局、社会形态、宗教与世俗力量对比,对世界大国力量博弈、文明结构的动态变化产生现实和深远的影响。

## 2. 诉求始于民生而非民主

民生危机不同程度地存在于众多阿拉伯国家。数年前的统计显示,不足 3 亿人口的阿拉伯世界贫困人口却接近 9000 万,至少 7300 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1000 万人失业,甚至在沙特这样富甲天下的王国,失业率也高达 30%。在今天,突尼斯和埃及在经济发展上的成绩单不乏良好和优异的国际评语。但是,两国的经济成果不仅未能及时转换为百姓兜里的财富,反而因受到世界经济危机冲击和本国经济结构升级瓶颈限制,陷入高物价、高房价、高失业率“三高”困境。生计难保、幸福缺失的社会不满情绪无处不在,民生艰难的对立面,却壁立着万亿石油美元的海外资产及帝王将相穷奢极欲的排场奢华。经岁延年,积累到临界点便一触即发。

## 3. 整个社会系统需要改版升级而非简单修补

受东方文化、政治传统和民族解放运动等多种因素的影响,阿拉伯国家在半个世纪前形成一批介于独裁与民主之间的“基利斯马”型权威领袖,如萨达姆、阿拉法特乃至倒台的卡扎菲、穆巴拉克和本·阿里,他们在带领人民实现国家与民族独立和提振国际地位等方面发挥过历史作用,做出过杰出贡献,进而长期成为国父般的精神和世俗领导,叱咤风云,影响世界。由于政治体制僵化,除个别被迫中止职务外,这些领袖无一不长期执政,把

岗位“坐穿”甚至把江山“坐瘫”。这种依附于个人权威的制度也使阿拉伯国家的政治生态严重单一化、脆弱化,政权内部、政党内部均不能实现有序更替和新陈代谢,外部更缺乏有效监督与制衡,或将公平竞争、轮替上岗机制虚化为摆设和陪衬。

权力高度垄断必然导致高度腐败,垄断权力缺乏有效监督与制衡,导致系统性的权力寻租和高层腐败,贪污腐败导致社会财富分配严重不公,国家政权貌似坚不可摧,实则已被蛀虫从内部啃坏大梁与承重墙,只需一个偶发事件,便轰然倒塌。政治腐败不仅是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等国的专利,而且是阿拉伯国家的普遍现象。“民不患寡而患不均”,民心向背已经决定了政权的命运。

内政无能外交失败导致威信扫地,特别是由于年龄与政治代沟的微妙作用,已构成占阿拉伯人口绝对主力的当代青年不再因袭尊老敬长传统,而是轻慢、蔑视权威。

确切地说,这场革命症结在于整个社会系统需要改版升级而非简单修补,是领导国家和民族的领袖之祸,是制度设计和发展模式之误。因此,只有颠覆现有制度和权威,才是解放自我和救赎民族的根本出路。

(汤摘自《人民论坛》2011.9 上马晓霖/文)

## 世界恐怖主义的主要特征及发展趋势

与上个世纪相比,新世纪世界恐怖主义有了一些新变化。

一、2001 到 2010 年十年间世界恐怖主义恐怖活动的主要特征

(一)宗教极端主义仍然是主要的恐怖主义威胁来源

自从上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以来,宗教极端主义在世界恐怖主义运动中的地位逐渐上升,在一些地区和国家甚至成为主导性恐怖主义根源。进入 21 世纪以后,以“9·11”事件为代表的国际恐怖主义浪潮,更吸引了国际社会的主要目光。在 1968 年到 2007 年间,MIPT 数据库共记录了 2770 起宗教极端主义型恐怖事件,占世界恐怖活动总数的 22.6%;但这些恐怖事件却造成了 13705 人死亡,占同期世界恐怖活动死亡总数的